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一家三代“刘老师”的育人情

新华社记者宋晓东

“刘老师好！”，在河南省郸城县的一所乡村学校里，学生的一句问好，引得3个人同时习惯性地点头应声，刘宝国、刘华和刘培爷仨仁人对视一眼，哈哈大乐。这种场景在他们身上时常发生。1967年，刘宝国成为一名乡村教师，他的儿子刘华、孙女刘培在家庭的影响下也相继投身乡村教育，一家“教书匠”、三代育人情，3个“刘老师”见证了我国乡村教育的40年巨变。

“踏上讲台我才理解父亲”

1994年出生的刘培是河南省郸城县秋渠乡益海小学的一名教师，和孩子们打成一片。回想起第一次踏上讲台，她说：“那一刻我才真正理解父亲，理解了他对教育的痴迷，对学生的爱。”刘培的父亲刘华也是一名乡村教师。在她的印象中，家务活都是妈妈一个人在干，父亲白天上课，晚上和学生们一起住校，虽说有个当老师的爸爸，但几乎没辅导过她的功课。“我觉得爸爸对他学生比对我还好，跟他赌了好几次气，可他忙得都没发现。”刘培说。

长大后，慢慢懂事的刘培看到父亲教出了一批批优秀的学生，走在路上总有人尊敬地喊“刘老师”，毕业多年的学生还常到家里看望父亲，刘培从“怨爸爸”变成了“崇拜爸爸”，自己也想“成为像爸爸一样的人”。高考完，刘培想都没想就报考了师范专业，毕业后，她毫不犹豫地选择去爸爸曾工作过的乡村小学当一名乡村教师。

“今天的她，就是20多年前的我，我也是因为父亲选择了做教师。”看着女儿在讲台上给孩子们上课，刘华想到了年轻的自己。40多年前，初中毕业的刘宝国是村里的“文化人”，

村干部请他当“先生”教孩子们读书，虽然每个月只给两元钱，还不如干农活赚得多，但刘宝国答应下来，从早忙到晚，十天半个月也不着家。“教孩子读书是做好事，能多出几个读书郎比啥都强。”刘宝国的话刻在了刘华心里，“第一次登上讲台，我想到的就是父亲，那时我就立志要像他一样做个好老师。”刘华说。

“40年农村最大的变化是教育”

从刘宝国17岁当老师开始，三代“刘老师”跨越了半个世纪，亲身经历、亲眼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教育的变迁。

刘宝国回忆说，他刚当老师时，教室是个土坯房，房顶漏雨、窗户漏风，黑板就是一块土泥墙，周边几个村只有这一个学校，有的孩子要跑5里路来上学。到了刘华读书的时候，正好迎来改革开放，农村教育条件明显改善。刘华说：“我读书时还是泥砌的桌子，木头的条凳，架子上挂块板就是黑板，几个年级在一起上课。到我当老师时，已经是铁书桌、木板凳和水泥黑板了。”

从破房子到教学楼，从木头黑板到多媒体一体机、从手写板书到电子课件……改革开放40年，不仅农村教育的硬件条件明显提升，教学方式也在不断创新。现在刘培不仅要有专业课知识，还要学习计算机，过去上课“写板书”，现在变成“滑鼠标”，课堂有声、影、图、文并茂，学生们更容易学习理解。

“这些年农村最可贵的改变是重视教育的观念已经普及。”刘华说。刘华记得，以前每到开学时，父亲的一个大难题就是找家长做工作，不让孩子辍学，到20世纪90年代他做老师时，辍学的孩子已不多了，但家长很少看管孩子学习，重视不够。“现在，所有家庭都把孩



▲上图：刘宝国在展示自己的教师资格证；
中图：刘华在展示自己的教师资格证；
下图：刘培在展示自己的教师资格证（12月13日摄）。
新华社发

子的学习当作最大的事，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的气氛越来越浓，这是我们最想看到的改变。”

“教育就是明天的希望”

刘培说，选择做一名乡村教师，是受家庭的影响，更是因为看到了希望。“知识改变命运，我们郸城县是贫困县，但我从小到大看到大多贫困家庭通过教育改变生活、改变命运，这给了我信心。”

作为一个农业县，郸城县一直带着贫困的帽子，大部分农民祖祖辈辈靠种地谋生，过着苦日子，教育成为改变命运的唯一方式。

刘宝国记得，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就有很多人找他补课，准备参加高考。当时一个叫刘保贺的年轻人已经24岁了，听说恢复高考后马上翻出了课本重新学习，每天干完活都找刘宝国补习，坚持3年终于考上了大学。

“教育就是明天的希望，培养一个大学生的愿望格外强烈。”郸城县委书记罗文阁说。据了解，2012年以来，郸城县每年有近8000名考生考上大学，其中农家孩子占到6成以上。如今，刘宝国已经退休，刘华也年近半百，一家人对教育的感情和对教学工作的思考汇集到了刘培身上。“对一个家庭来说，教育是希望，对一个国家来说，教育是未来，我想像爷爷和爸爸一样，一辈子做一个好老师，为农村孩子的成长做出一点贡献。”刘培说。新华社郑州电

▲上图：刘宝国在展示自己的教师资格证；
中图：刘华在展示自己的教师资格证；
下图：刘培在展示自己的教师资格证（12月13日摄）。
新华社发

被刺伤仍死死抓住嫌犯，他的生命定格在30岁

新华社记者肖艳、汪军

“30岁，正值灿烂的年华，缉毒之路何其艰辛！英雄，一路走好！”

12月20日17时许，贵阳市公安局花溪分局贵筑派出所民警马金涛在抓捕涉毒犯罪嫌疑人时，不幸被对方用利器刺伤，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18时20分壮烈牺牲，年仅30岁。

花溪分局政工室主任赵志介绍，马金涛虽然是公安院校毕业生，但他肯学肯干，善于钻研。“一年跟着干，两年单独干，三年成骨干”，马金涛用最短的时间实现了从“门外汉”到职业警察的转变。

12月20日，贵筑派出所接到一条线索，这一天并不当班的民警马金涛打算陪生病的妻子到医院看病，在得知这一情况后，他主动请缨参与抓捕。

16时许，马金涛给妻子发了一条微信，叮嘱妻子自行先去医院，自己忙完以后再去找她。

17时许，马金涛和同事来到贵阳市一居民楼，欲对居住在此的涉毒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为避免打草惊蛇，马金涛安排同事在车上等候，自己在现场蹲守。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犯罪嫌疑人突然打开了房门。马金涛见状立即上前对其实施抓捕，犯罪嫌疑人负隅顽抗，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搏斗中，马金涛不幸被犯罪嫌疑人用利器刺伤，他强忍着剧痛，死死抓住犯罪嫌疑人的衣袖。对方激烈反抗，挣脱逃跑，马金涛紧跟着追了上去，但因伤势过重，倒在血泊中。

受伤的马金涛被同事以最快速度送往医院，然而，经全力抢救无效，马金涛牺牲了。

21日凌晨，经过专案组民警8个小时的努力，杜某某等3名犯罪嫌疑人被全部抓获。“他这么壮烈地走了，唯有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才是对他最好的告慰。”同事孙玲说。

在同事眼里，马金涛是“工作狂”。前段时间，为调解一起复杂的纠纷，他连续一个月吃住在单位。马金涛的妻子曾是黔东南苗族侗族自

治州的一名教师，为全力支持马金涛热爱的公安工作，她毅然辞职，到贵阳做他坚强的后盾。

2017年11月29日，马金涛的女儿出生，为了让马金涛能更好地投入到工作中，父母从河南老家来到贵阳帮他照顾家庭。

工作以来，马金涛参与办理各类案件100余起，打击各类违法犯罪人员80余人，调解各类矛盾纠纷400余件。

“我们肩上的枪很重，我们维护社会治安的心很热。”这是马金涛在国庆假期坚守一线时发布在朋友圈的感想。

和马金涛同年入警的一名战友在朋友圈留言：战友走好，后续我们会接上。新华社贵阳电

靠做“化学实验”，洋教授成了中国“网红”

本报记者袁全、贾剑

在人人都渴望变成“网红”的短视频平台上，保持热度很难。一个白胡子外国老头却独辟蹊径，靠扎实的化学实验直播异军突起，短短数月就“吸粉”200多万。

他叫David Evans，中文名字戴伟，今年60岁，是一位来自英国的化学家。视频里他总是戴着一副护目镜，穿一件白大褂，体态丰满，面带微笑，常被小朋友说成“肯德基爷爷”。

在视频里，他摇晃手中的烧瓶，里边的液体因为震荡与瓶中空气接触，不断变化颜色；他在洗洁精中加入双氧水和催化剂，瞬间产生的大量气泡，从试管中奔涌而出，直顶天花板；他还表演吸入密度比空气低的氦气，让声带震动的速度加快，声音变得像唐老鸭。

戴伟中文流利，语言幽默，视频里常传来小朋友的尖叫和欢呼。他最受欢迎的视频拥有上千万的点击量。

好奇中国

总是能激发观众好奇心的戴伟，当初来到中国正是源于好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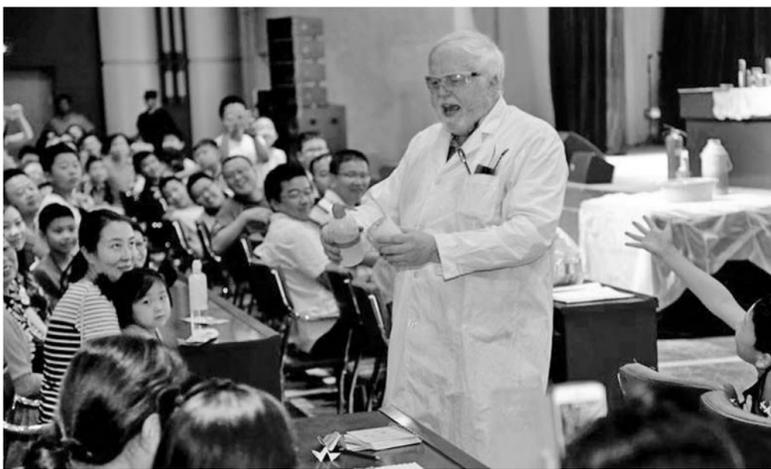
从少年时代起，戴伟就有两大爱好。一是化学，他常在自己家做实验。而除此之外，就是远在地球另一端的中国。70年代初，中国还没有实行改革开放，对他来说这还是一个“神秘国度”。

他周国的大学，对他来说这还是一个“神秘国度”。他周国的大学，对他来说这还是一个“神秘国度”。他周国的大学，对他来说这还是一个“神秘国度”。

他周国的大学，对他来说这还是一个“神秘国度”。他周国的大学，对他来说这还是一个“神秘国度”。他周国的大学，对他来说这还是一个“神秘国度”。

他周国的大学，对他来说这还是一个“神秘国度”。他周国的大学，对他来说这还是一个“神秘国度”。他周国的大学，对他来说这还是一个“神秘国度”。

他周国的大学，对他来说这还是一个“神秘国度”。他周国的大学，对他来说这还是一个“神秘国度”。他周国的大学，对他来说这还是一个“神秘国度”。



▲戴伟利用闲暇时间为青少年做科普。 黄文摄

但此后的每一年，戴伟都会来中国一趟。慢慢地，他发现城市物质逐渐丰富了，高楼拔地而起，人民也富起来了。他越来越喜欢这个日新月异的国度。

“这和英国很不一样。”戴伟说。1996年，他辞去了英国大学的工作，决定在北京定居。朋友们都认为他疯了。面对大家的质疑和不理解，戴伟回答说，别人只看到不好的地方，而他看到了中国的巨大潜力。

他成了北京化工大学的老师和研究员。他开始自学中文，去各地旅游，每年春节还受邀到同事的农村老家过年。尽管条件艰苦，但村民们总是热情慷慨地接待他这个“老外”。他记得有一个孩子见他满头白发，便喊他孙悟空。

戴伟很受感动，他希望他参与的研究能为中国老百姓脱贫致富做出贡献。在一个科研项目，他和中国研究者设计了一款用于塑料大棚薄膜的新型添加剂，可以提升大棚的保温性能，让农作物长得高，产量大。

更重要的是，由于晚上的保温效果好，可以减少大棚烧煤炭取暖的需求，更加环保。

他还参与研发新型电缆阻燃材料，让电缆即使着了火也能降低烟雾浓度，更加安全。

因为贡献卓著，戴伟于2004年被聘为英国皇家化学会北京分会的主席；2005年，他获得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这是唯一颁发给外国人的科技奖励。三年后，在英国，戴伟获得大英帝国官佐勋章。他对颁奖的查尔斯王储说，欢迎您到中国来。

那些曾经认为戴伟疯了英国朋友也为他的远见点赞，有的还请他帮忙联系与中方的合作。今天，中国的科技实力也迅速提高，名列国际前茅。戴伟所在的科研团队，当年只有简陋仪器的实验室，如今已配备了价值上亿元的设备。科研队伍从过去的几个人，发展到了上百人。

“过去别人认为我是来帮助中国的，现在，中英的科技合作是一种互补了。”戴伟说，中国的很多优势是英国不具备的。他现在正帮忙促成中英美三国合作的科研项目。

执着科普

定居中国后的22年时间里，戴伟逐渐能讲出流利的中文，儿话音也说得地道，还养成了对川菜偏爱和对胡同文化的兴趣。

近来，他又开始“学雷锋”，利用闲暇时间为

青少年做科普。

这份新事业源自一次偶然的发现。那次，他受邀为中学生做科普实验，发现同学们表现得很吃惊，就像从来没有见过化学实验一样。

原来，在中国的课堂上，出于安全考虑和设备条件限制，即便是大城市里的重点中学，学生在化学课上做实验的机会也不多，更不用说偏远的农村地区。化学元素、理论、方程式都是靠学生死记硬背，学起来很枯燥。

但戴伟认为，“化学的乐趣就是动手做实验。”于是从2011年开始，戴伟每个月都带研究生去北京周边的打工子弟学校做化学实验。那里小朋友求知的眼神让他想到了曾经的自己。

当年介绍戴伟来北京化工大学的段雪教授说，没想到戴伟在科普上坚持了下来，已经把兴趣当作了事业。

戴伟希望通过实验让人们喜欢化学，消除对化学的误解，认识到化学可以让生活更美好。在中小学，戴伟的实验总是受到好评。他喜欢讲笑话、打比喻。比如把催化剂比作雷锋，把冒烟的烧瓶比作阿拉丁神灯，把气泡泡沫比作大象的牙膏。有趣的表演常常逗得观众捧腹大笑。

短视频的流行，让他看到了更大的可能性。然而他的直播并不轻松。别看镜头前只有几分钟，背后却要付出很多：搬仪器、洗设备、准备道具、清理实验室……戴伟常累得满身是汗。

但他乐此不疲，因为他坚信科普是科学家的责任，科学家做科普的优势是保证准确。他说英国大科学家法拉第也曾每个周末为老百姓义务做科普，“现在我也想和他一样。”

有观众称赞他是“魔术师”“魔法师”。但戴伟认为自己不懂魔法，也不是魔术师，因为魔术师绝不会说出魔术的秘密。他自己只是一名老师，做实验的目的是普及科学知识，通过化学实验激发人们思考、研究，并传递科学知识。

“他得知像快手、抖音这样的短视频APP在中国三四线城市和农村地区十分火爆时，他就更来了干劲儿，因为这可以让很多平时没有机会操作实验的学生看到科学的乐趣和神奇。”

即便已经60岁，戴伟并没有打算休息。北京化工大学刚刚给他建在遍布重点实验室的号楼里修建了一间现代化的科普教室。他也加入了一个由中国科学家发起的科普协会，准备继续为更多学生做科普。

戴伟还期待着与中国发生更多的“化学”反应。

尤垂镇：富民快车道轻易不踩急刹车

（上接6版）所谓“带征率”类似定额税。“比如做陶瓷的，你这里有10孔，我一孔算你5毛钱，你10孔就是5块钱，一个月就收你5块钱。”尤垂镇对新华社记者解释。

曾在晋江县委工作的王庆祥回忆道：“尤书记说过，要养鸡生蛋，不要杀鸡取卵。只有生蛋才能长久。”

“养鸡先放水，水大鱼才大”的道理人人都懂。宽松的税收政策，既有利于涵养税源，更有利于激励企业扩大再生产。加之，当时晋江农民办企业普遍存在财务会计水平低，税务一线检查人员不足等现实问题，“带征率”无疑符合晋江实际。

然而，“带征率”属于税收包干，与当时的税法政策有冲突。尤垂镇和曾文解商量好，责任一起担，风险一起扛。

今天，记者很难真切体会尤垂镇和曾文解当初面临的压力。年近耄耋的老人回顾这一段往事时非常洒脱：“改革要创新，就是要闯嘛，不能怕担风险。”

当时，尤垂镇向晋江地委领导作了汇报，获得了领导鼓励“大胆地试”。新华社每日电讯记者在1987年晋江县税务局《关于核定乡镇企业所得带征率的几点意见》中看到“三年来的实践证明，乡镇企业一般乐意接受，只要带征率定得合理，国家税收收入也不会受到影响。”

实施“带征率”后，晋江经济获得了高速增长。邻县也纷纷向晋江取经。据说，“带征率”被晋江地委领导称作是尤垂镇的“秘密武器”。

尤垂镇不止一次为扶持晋江企业发展担风险。今天晋江市的龙头企业恒安集团在1985年从安海镇后林村搬进安海镇区时，只在安东街道的两个小店里“蜗居”。

尤垂镇实地调研后认为，工厂放在小店铺里根本没有发展前景。为了扶持安海企业发展，晋江县委决定把原来只种木麻黄的海滩，填起来开发成桥头工业区。尤垂镇同意安海镇边平整土地边走边报批程序。

安海镇的情况很快被上级领导知道了。时任安海镇党委书记的陈永恩和镇长被叫到泉州做深刻检查。

陈永恩去泉州之前，先到晋江县委找到了尤垂镇。尤垂镇了解情况后说：“要做检查，也是晋江县去做。我带头做。”

尤垂镇向地委张明俊书记汇报了此事，获得了领导的支持。

晋江市政协副主席周伯恭对新华社记者回忆道：“尤书记和当时的县委班子想方设法给企业松绑，创造发展条件。那几年是晋江经济发展的关键节点。”

当年有省里的领导曾善意地提醒过尤垂镇，晋江也有不少农业的典型，既然压力这么大，晋江何不转向发展农业？尤垂镇和县委一帮人想都没想，谢绝了省领导的好意。尤垂镇想得很清楚，晋江冲在改革开放前沿是因为有侨乡的优势。但晋江成为侨乡，恰恰是因为人多地少，历史上才有老百姓下南洋谋生。重走农业为纲的路子，晋江人只能继续守穷。

“那个时候政治压力大，大家认识也不统一。但是改革方向大家看清楚了，就是搞商品经济，要吃饱饭，要让老百姓富起来。”尤垂镇对新华社记者说。

拍板给企业“戴帽”

1989年，晋江的改革发展面临“晋江假药案”后又一次生死考验。

晋江的乡镇企业脱胎于集体经济名义之下的家庭作坊。在晋江，人们将挂靠乡镇或社队企业的联户企业叫戴“红帽子”。

当年，国家实施“治理整顿”政策措施，要求各地将非国有、集体企业重新定性并换证。一时间，“重新定性”与“土改时定成分类似”等论调，与姓“社”姓“资”的激烈争论相呼应，引起民营企业恐慌——戴“红帽子”的企业怕摘帽，没有帽子的争戴“红帽子”。

尤垂镇回忆，在县委常委会上讨论时，大家都觉得这个问题比较敏感，处理不好就会重创晋江民营经济。为继续支持和保护乡镇企业，县委决定放宽对集体企业的认定标准：即“自愿联合、合股经营、共同劳动、民主管理、实行按劳分配和股金分红。在税收利润中留出一定比例的公共积累的企业。”

更多连厂名都没有的家庭作坊式小工厂怎么办？尤垂镇果断拍板：晋江的工厂属于加工工厂性质，就得大量用工。县政府还为此下文：用工数量要实事求是，按乡镇企业对待。

“我们决定用这种变通方式保护民营经济，帮他们戴‘红帽子’，吃‘定心丸’！”在福建泉州府的寓所，尤垂镇老人对新华社记者坦言，当年对政治风险亦有心理准备。

“当时会场气氛很紧张，主持会议的领导要求大家不能用笔记，用耳朵听进去牢牢记在脑袋里。县里决定立足晋江优势和自身实际，明确三人以上合伙的企业视为公有制，要求各乡镇认真贯彻执行。”被叫去开会的乡镇领导回忆道。

由于“集体经济”定义笼统，未对股人数、彼此关系等作出具体规定，众多“夫妻厂”“父子厂”“兄弟厂”得以戴上“红帽子”。陈埭镇99%的民营企业被定性为“集体性质”。为保证换证工作完成，镇里干部加班加点，晚上都不回家。

时任晋江县工商局局长林树榜对新华社记者回忆道，当时县工商局要求限时办理，从企业申请到审批结束，不能超过一个星期。据工商部门档案显示，1992年全县共有内资企业7611家，其中集体所有制企业7308家，占比高达96%以上。带上各种帽子后，晋江企业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治理整顿”中，一直保持着稳步发展的态势。

身为一名上世纪80年代的县委书记，尤垂镇向新华社记者说出了自己的初心：“我这一辈人都是农民的儿子。当了共产党的干部就要为民办事，敢付出，敢担当，敢负责任，敢冲，敢拼，不计较。”

就连说五个“敢”的尤垂镇记忆犹新的，是1991年因“假药案”黯然离职的原福建晋江市委书记项南到晋江故地重游。当时已调离晋江的尤垂镇参与陪同。

“陈埭镇的群众奔走相告说，项书记来了，项书记还更健康。大家非常高兴。不一会儿鞭炮就放起来了。马路上，阳台上……走到哪里，哪里都在放鞭炮。”尤垂镇说。